



王宗炎

王宗炎（1913年—2011年），广西合浦县人。民盟成员。

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46年起任中山大学外语系讲师，1951年晋升为副教授，1970年起任原广州外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1977年晋升为教授；1979年起任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会委员，《现代语言学丛书》主编之一。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11月退休。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之一。

从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曾任公务员、报馆编辑、海关关员，又转到教育界任中学教员，直至成为大学教授。

1970年，进入广州外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除了承担联合国文件翻译，还承接了一些名著翻译。主要译作包括：《亚当·密茨凯维支传》《光荣与梦想》第一册，《言语行为》《名利于我如浮云》等等。

1978年下半年，桂诗春创办的、广州外语学院主编的《现代外语》第一期面世。如今，《现代外语》已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确认的“双效期刊”、“美国教育信息资源数据库”（ERIC）收录刊物。

最后一本著作《英汉语言问题面面观》出版时已94岁；最后一篇文章《感谢与祝愿》发表时已95岁。曾言“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王宗炎对当代中国翻译学的贡献

王宗炎，男，1913年1月出生，广西合浦人。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46年任中山大学外语系讲师，1951年晋升为副教授，1970年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副教授，1977年晋升为教授，1979年任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

王宗炎是中国语言学会第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会委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现代语言学丛书》两位主编之一。

王宗炎193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英文系后，曾历任公务员、报馆编辑、海关人员、中学教员、中山大学外语系讲师和副教授，兼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驻广州特约通讯员、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对国外语言学知识与理论的评介以及对语言学著作的评论方面。

王宗炎对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建树颇多，而且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主要译作包括：《亚当·密茨凯维支传》《光荣与梦想》第一册，《乔姆斯基评斯金始》《名利于我如浮云》《黎天睦论‘着’的核心意义》等等，其中《光荣与梦想》曾获1984年广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科研二等奖。

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中，王宗炎结合丰富的翻译经验，在实践中探索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见解。其翻译思想丰富而深刻，涵括语言、文化、文体、机器翻译等多方面，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术语翻译、风格翻译、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对于翻译的本质和标准、翻译的原则和规范、翻译的方法和技巧，及机器翻译、科技等问题也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不仅涉及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诸多方面，而且还在若干领域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即便是对今天的翻译理论研究，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由于王宗炎是一位公认的语言学泰斗，国内学术界似乎更多地关注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和贡献，而他的翻译实践及译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却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鲜有人知道他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上曾有过的耀眼的辉煌，更鲜有人知道他还是当代中国翻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可见其在当代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

历史转向的先行者

翻译学圈内鲜有人知道，王宗炎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翻译研究。而且他一开始所从事的就是翻译的历史研究。1948年，王宗炎在《民主时代》第2卷的第2期和第3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翻译史话研究的重要文章，分别是《古代的翻译》与《求经和译经》。这两篇文章，对古代中国的一些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使我们

能够更好地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和特征。王宗炎的学术研究生涯，是从翻译研究开始起步的。

在《古代的翻译》一文里，王宗炎基于历史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了中国最古老的两个译本：前汉时期的越人歌和后汉时期的慕化诗三章。他认为，中国的翻译事业虽然大兴于近代，它的起源却和汉族一样古老，最早的翻译是前汉时期刘向《说苑·善说篇》里的“越人歌”。基于对“越人歌”的译文分析，王宗炎认为：“这越人歌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歌，一则因为它是我们所见的最古老的翻译，而且赠有原文；二则因为它的题材是同性恋，由此可以窥见古代男风的流行。可是更值得注意的，它虽是一世纪以前的产品，可是文字流畅，节奏和谐，诗意丰富，竟可以说是翻译的模范。”他还特意引用了梁启超先生在《翻译佛典与文学》里对越人歌翻译的评论：“鄂君歌译本之优美，殊不在风骚下”。在越人歌之后，另一古老的翻译是后汉书西南夷传里的三首汉语与川滇少数民族语言互译的《远夷乐德》《远夷慕德》和《远夷怀德》三歌。与越人歌一样，也都是附有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

继《古代的翻译》之后，王宗炎发表了《中国翻译史话之二《取经和译经》》。在这篇文章里，王宗炎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佛经的翻译，回顾和概述了佛经在中国从后汉时期到元朝期间长达 1200 多年的传播和翻译史。王宗炎高度评价了鸠摩罗什、玄奘、真谛、法显等诸多高僧不畏艰险，远赴万里的取经精神和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译经态度，还将古人译经和现代人译书的方法和态度进行了比较，对流行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翻译风气表示了批评，这对于今天的翻译研究还有启示。

中国翻译学界对佛经翻译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翻译一直都不怎么重视。佛经翻译的研究本主要集中在佛教界和史学界，直到上世纪末受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的影响之后，对翻译史的研究才又重燃起中国翻译学界的兴趣，从这个角度看，王宗炎先行的身影让人尊敬和佩服。

语言学转向的奠基者

建国后，王宗炎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的英文秘书，并负责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翻译论文题目和摘要。在这一期间，他仍然坚持翻译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译学论文，如《音译和义译》《音译的几个问题》《词儿的义译》《漫谈译名》《评吕叔湘译〈伊坦·弗洛美〉》等。比较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翻译的历史研究转向翻译的语文研究。

在《音译和义译》一文里，王宗炎认为，“对于没有现成译名的外国词语，……不外乎四种翻译方法，就是音译、义译、音译兼义译、音译加注解等。”因此，他在《翻译通报》上围绕“音译”和“义译”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王宗炎在音译的几个问题里指出，目前“统一音译的工作，恐怕比统一义译更重要，而且

需要更迫切。”在《词儿的义译》里，他重点分析和讨论了五种义译方法，分别是“直译法”“添字法”“减字法”“拐弯法”和“杜撰法”。在《漫谈译名》里，他开宗明义指出：“译名有三难：一难于正确，二难于合民族形式，三难于大众化。”表现出对严复的信达雅的深刻理解。他对于严复所说过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也颇有同感，体味甚深。

《翻译通报》是中国翻译界国家级翻译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刊，在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短短的两年内，王宗炎在这一刊物先后发表了5篇重要论文，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的语言方面。这些论文的发表使他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界瞬间声名鹊起，从而奠定自己在中国翻译研究界的学术地位。

自改革开放之后，王宗炎开始关注和追踪国外语言学发展的前沿动态，积极引进和评介国外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学研究论文，如《美国学者对语言学中若干问题的探索》《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评哈利迪的〈现代汉语语法范畴〉》《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述评和试用——评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等。为了推动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王宗炎和许国璋一起主编《现代语言学丛书》，使中国读者第一次能从中文的著作中学习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

语言学作为研究语言的现代学科，为语言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从而对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王宗炎就非常重视国外学者运用语言学理论从事翻译研究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发表在《翻译通讯》上的《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一文。该文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英国翻译学者纽马克的语言学译论。纽马克强调翻译原则与语言功能的关系，属于典型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模式。该文还提出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个人见解，如译文意思为什么会走样、同等效果论能否行得通等等。而这些也正是王宗炎之所以会选择评介纽马克这篇翻译理论文章的真正原因。尽管翻译理论古已有之，却一直纠结于意译与直译、翻译标准之争，以及翻译困难之类的问题和细节上。

尽管从1979年开始，国内其他一些刊物陆续刊登了介绍奈达和纽马克译论的文章，但在翻译学界一直影响不大，而王宗炎的这篇文章在《翻译通讯》上发表，加上他作为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该文立刻引起了翻译学界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翻译学者中一时间掀起了向外看的热潮，尤其是学习和引进西方语言学翻译研究，这一现象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视为中国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的开始。自此以后，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翻译研究介绍、引进的重点对象，而语言学理论也被看作翻译学学科化的基础理论。随着西方语言学研究模式的不断渗入和采用，中国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悄然转向了语言学范式在此过程中，作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宗炎，他的几篇文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文化转向的开拓者

一般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西方，而中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仔细梳理当代中国翻译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传到中国之前，中国翻译学界在董乐山和王宗炎的引导下，已经悄然地从翻译的语言研究开始向文化研究转向，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始于 1980 年董乐山和王宗炎发表的两篇以“知识”为关键词的文章，即董乐山的《翻译与知识》和王宗炎的《求知录》。

“文化”没有被明确地提出，并不能说中国的翻译学者就没有注意到文化。王宗炎所说的“知识”实际上指的就是文化知识，换句话说，是通过“知识”为切入点，将翻译研究的语文学和语言学范式转向文化范式。王宗炎认为，翻译时不能只关注语言的方面，源语文化的知识同样至关重要。

在王宗炎的文章中，文化词汇的翻译问题被提出，在当时的中国翻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翻译学界开始关注翻译研究的文化方面。

此时，我们再来讨论西方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和中国翻译学界原生态的文化转向，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二者的差异。王宗炎所推动的中国式文化转向，其诉求与西方学者明显不同，他关注的是“源语的知识”，起因是他参加了《光荣与梦想》的翻译工作（王宗炎主译第一卷，董乐山主校），他们说的“知识”主要就是指翻译该书时所碰到的美国当代文化知识，由此引发了他对那些在当时词典上查不到的文化词汇或义项的关注，反映了由译者推动的文化转向的问题意识指向。

其实，文化转向的标志并不是论文或专著的题目用没用“文化”。好在中国的翻译研究里，前有董乐山和王宗炎推动的中国式文化转向，后有西方的文化转向介入，因此在文化这一领域里，中国的翻译研究总体是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宗炎作为中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开拓者，是当之无愧且功不可没的。

机辅翻译的引导者

尽管王宗炎所从事的是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却一直非常重视科技翻译与机器翻译。早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看世界，王宗炎就对机器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机器翻译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多少商号、企业、政府机关正在使用它？效果如何？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它发展最快？朝什么方向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王宗炎先生一直都非常关心，且经常阅读国外最新的科研报告和资料，关注西方各国机器翻译的研究动态和进展，期望找到比较清楚而全面的答案。他陆续发表了若干篇关于国外机器翻译研究的文章，引起了翻译学界对机器翻译的高度关注。

1979年王宗炎在《语言学动态》发表了《美国新翻译机器问世》一文，指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卓拉市韦德纳通讯器材公司已发明和创造了一种新翻译机器，叫做多种语言调语处理机”。时隔三年，王宗炎又在《国外语言学》发表了《停滞、复苏、前进：机器翻译二十年》的重要文章，对世界各国机器翻译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状况进行了概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宗炎对中国机器翻译的殷殷期望与憧憬。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翻译如今已经成为国际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和西方一样，当今的中国也有着无数的科学家和翻译工作者在为这一梦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利用机器翻译在各民族各文化之间进行无碍的相互沟通，也不再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缥缈梦想。但在中国的翻译学者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王宗炎先生无疑是先行者和引导者。

王宗炎的榜样力量

王宗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以其对语言学的研究和贡献而闻名全国，素有“北许南王”之誉。同时，他也是我国外语界老一辈优秀的翻译家，秉持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治学之道，在翻译研究领域有不少启发性的独到创见，他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思想对当代中国翻译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王宗炎继承和发扬中国悠久的译学传统思想，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语言学翻译理论，促进中国的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启动了我国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预热了中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激发了无数中国人对机器翻译的梦想和对翻译现代化的憧憬，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榜样的力量。

目前，我国翻译界对中国本土的优秀翻译家或学者的翻译思想的系统研究太少，这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翻译研究现状不符。因此，对于翻译家研究，尤其是像王宗炎这样老一辈的优秀翻译家的理论思想，更应引起重视，以期得到进一步的系统而深入研究。